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更正启事】		
【史海钩沉】	她的名字叫关雅琴	王友琴
【研究综述】	从土改到文革：重审毛泽东土地改革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宋永毅
【追根溯源】	土改七十年来的“阶级划分”政策的恶意、随意性及其后果（上）	丁 抒
【童年旧事】	冬至的记忆	张 华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更正启事】

读者指出，本刊第1036期（《华夏文摘》增刊第1204期，zk1912d）所载署名展露的文章“必须重视有关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的探讨”抄袭了王锐的文章“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王锐先生原文载作者博客，后于2012年被《共识网》转载。本刊未能察觉，是我们的失误，我们已经在网页上予以更正，并在此向王锐先生道歉。——本刊编者

~~~~~  
【史海钩沉】

她的名字叫关雅琴  
——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的十八岁服务员

• 王友琴 •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在学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这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里的教育工作者。

从6月初起，一批校长和老师被指控为“反革命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等等遭到“揭发”和“斗争”。对他们从进行口头攻击发展到身体攻击以至被打死，前后是两个月的时间。

在我写的关于卞仲耘校长之死的文章里，我写到，在卞校长被打死之后，8月下旬，有一名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打死。红卫兵说她是“流氓”。我没有能单独给这个十八岁的小服务员写一个单篇，因为不知道她的名字。准确地说，是“忘记”了她的名字。因为在1966年，学校里的人都知道在旧化学实验室里打死了人。三个月后，形势有了些变化。她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到学校来控诉他们的小妹妹被打

死。我在校园里看到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妻子。他们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肥大宽松，是淳朴憨厚的人。他们为他们的小妹妹十分哀痛。

我记得曾经把她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后来我当“知识青年”下乡了，我父母也随即放下了。我留在家里的笔记本之类，都丢失了。

2000年我写完“卞仲耘”一章的时候（有两万字长），我以为我能很快找到小服务员的名字。当时全校有一千六百名学生，一定有人记得。那些家一直在北京的同学，可能还会存有当年的资料。可是，十多年里却一直没有能找到。有一位同学说，玉华台饭馆已经从西单搬去“五洲大饭店”附近了。她去了那里询问，但是那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另一位同学去了饮食公司询问，因为饭馆都归饮食公司管。但是公司说他们没有她的记录。

我觉得特别抱歉。一个十八岁的小服务员，被打死了，还被忘记了。

2017年，教过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她叫关雅琴。

我很受感动。这位老师记得她的名字，尽管51年过去了。

关雅琴遭遇了什么？

她是西单“玉华台饭庄”的服务员，上过初中，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她被抓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校园中，用绳子绑在旧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她。她发出惨叫声。这个地方离校门很近。过路的人听到了她的惨叫。打着打着，她的惨叫声停止了。打她的红卫兵叫来了学校医务室的刘大夫。刘大夫来后，用手指拨开她的眼皮，看了以后说：瞳孔已经散了，她死了。你们把她放下来吧。

一名校友写道：

“到了学校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红卫兵从街上抓来了一对流氓！现在就关在校门左侧的平房里。我和一名同学赶快跑去，想看到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从上着锁的房间门缝外往里看，只见屋子深处的柱子上绑着两个人，大概是被打的吧，两个人都垂着头根本看不见脸。听同学说两个人在街上有不良行为。看来两个人是情人。20世纪60年代的情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能有什么不良行为呢？像现在的情侣一样在人前拥抱、接吻，是不可想像的。顶多话语、动作比常人亲热一些而已。无法抑制的爱情外露在红卫兵看来就是流氓行为！这给两个情侣带来了杀身之祸。

我们不忍再看下去正要离开，来了几个红卫兵打开门进去了。我们二人直觉到不好，加快了离开的脚步。果然从后面传来了怒骂声、皮带的嗖嗖声和惨叫声。

后来听说这对情侣，两个人都被打死了。”

但是现在仍然不知道是哪一天，关雅琴被打死了。人们只记得，是在8月下旬，是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8月18日）之后。那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那个盛大集会暴力大规模升级。施暴对象，从学校的校长、老师，扩大到校外的居民，主要受害群体有所谓“小流氓”，信仰宗教的人，拥有私人房产的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还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文革后的《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说，1966年8月9日，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但是报纸没有说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

1966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园里，有两个人被打死了：卞仲耘和关雅琴。卞仲耘是校长，五十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关雅琴是饭馆服务员，十八岁。他们本无关联，但是都不幸成为文革对象，都未经审判，都被红卫兵打死。

希望读者中有人知道关雅琴的被害日期和其他情况。

写于2019年11月3日

~~~~~

【研究综述】

从土改到文革：重审毛泽东土地改革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 宋永毅 •

今年，2019年，是中共建政后发动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以及与此平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70周年。

由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美国劳改研究基金会主办，美国《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编辑部和台湾民主基金会等协办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的国际研讨会于9月18日到9月20日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顺利进行。五十多位来自海内外的学者汇聚一堂，就中共的土地改革的国际背景、历史渊源、理论实践、暴力土改的前奏和后果等等方面进行了严肃深入的探讨。这是迄今所知的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彻底否定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共收到来自全球学者43篇学术论文，其中有29篇为大会演讲论文，14篇为书面发言。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有16篇。会后，我们又在海外出版近百万字的、上、下两册的论文集，以飨万千读者。

一个问题会迎面而来：时过境迁了70年，是否还值得这么多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重审和辨析？换句话说，70年后的今天再来重新研究和否定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答案是非常肯定的。这不仅因为70年来中共官方制造了种种关于他们的土改的“伟大成就”的政治神话，导致毛泽东土地改革的血腥真相至今还没有被全部揭露；还因为70年前的土地改革的后果正阻滞着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健康进程；更因为而当今的中共领导人千方百计地想让整个民族遗忘历史的教训，以便他们可以顺顺当当地沿着这条独裁和极权的道路走下去。

◇ 七十年来政治运动的“原型”和不断重复的“情结”

中共建政伊始，便发动了所谓的“三大政治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朝鲜战争。一眼望去，便不难发现其中“土地改革”是最主要的核心所在。朝鲜战争前后虽然也有宣传性的政治活动，但其实质还是军事行动。镇压反革命是与之平行的，但很大程度上又是为土地改革衍生并为之服务的政治运动。中共的宣传机器，至今为止还在不断地传播着：土改把“农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神话。（1）恰好西方的神话学研究中有一种“原型批评”（Archetype Literary Criticism）的方法，它源于20世纪初英国的古典学界崛起的仪式学派，大成于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年）。其要点在于研究神话中反复出现的各种

意象仪式、内在结构和人物类型，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形式，即神话原型。如果我们把它套用到作为政治神话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会议所收到的论文中的发现，我们也不难找到土地改革作为中共政治运动“原型”的一些特征和要素：1、阶级划分的运动理论基础；2、法外杀人的群众暴力形式；3、劫掠私产的国家财政机制。

第一，是“阶级划分”的运动理论基础。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划分阶级成分的尝试。通过这一方式，中共撕裂了整个中国社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以等级制为特征的身份政治制。这一土改的基本理论旨在煽动仇恨，制造敌人，挑动一部分民众去迫害和杀戮另一部分民众，成为中共后来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治国的理论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与会的学者研究土地改革，但并不囿于“土地”，相反把批判和颠覆中共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放在首位。大陆学者叶曙明先生不乏见地地指出〔2〕：

历史学家认为，重新分配土地，改变土地所有制，是土改的意义所在。土地收归国家，也是对土地所有制的改变。但从土改之初许诺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后来的兑现情况看，土地在农民手里，只是昙花一现的过渡，几年后就全部收归国有了。因此，土改的分田分地，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不过是发动群众的一种方法而已。

土改的真正意义所在，是划分阶级。……划分阶级，实际上，就成了农村未来政治的重要基石和支柱。

在论文〈土改阶级划分政策的恶意、随意及其后果〉中，北美学者丁抒教授更进一步地指出：

对社会划分“阶级”，源自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固化的社会阶层，地主和农民之间不存在一条阶级鸿沟。……农民与地主的角色转换一直在乡村社会进行。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三个人的父辈都是实例。……中共的土改，要铲除传统文明，颠覆乡村社会，一是靠启用贫雇农、无业游民当村干部，二是靠极大地妖魔化地主富农，制造“阶级仇恨”，以达到“消灭地主阶级”的目标。……中共将抄没地富财产赋予“阶级斗争”的崇高名义，把抢夺解释成“土地还家”、“财产还家”。再加上“大家都抢”，平素从不偷、不抢的贫雇农们也就随大流，心安理得地当了一回强盗。

纵观毛泽东时代数十次的政治运动，中共确实具有浓厚的“阶级划分”的政治情结。不仅每一个地区的土改结束后都有对于阶级划分的重新复查和再划分，即便是在农村已经走上集体合作化的道路后，中共还不停地抓所谓的“漏网地主”。比如，1955年10月22日，贵州遵义地区赤水县在县党代会的“重新划分阶级”的运动中清查出了“80多户土改中漏网地主，有些并混入互助合作组织”。为此，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一个〈关于土改中漏网地主土地处理意见给贵州省委的批覆〉（1955年11月17日），表示坚决支持

〔3〕。上世纪六十年的四清运动里，中共中央认定：“现在农村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阶级成分比较混乱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有必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清理阶级成分的工作，就是说，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对每一个家庭的成分进行审查和评定，并且建立阶级档案。”〔4〕实际上，四清运动成了一场大规模的重新划分阶级成分的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全国城乡大抓“漏网地主、富农”，原来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中“不划阶级”的政策也被全部推翻。中共中央于1971年8月12日发布了〈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指示〉，“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分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分。”〔5〕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9年2月27日，中共的国务院才发文推翻了上述“重新划分阶级”的错误文件。此外，中共的每一场新的政治运动，还会划分出新的属于“阶级敌人”的成分来，如五七年反右运动后产生的“右派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新划

出来的“走资派”。总之，中共的这一“土改情结”的目的，正是为了制造出更多无端的敌人来〔6〕。

令人十分忧虑的是：这一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至今为止还被铭刻在中共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上：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7〕。

第二，是“法外杀人”的群众暴力形式。这是指不通过起码的司法程序，煽动并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暴民）运动来杀人的形式。原中国社科院法律研究所的徐立志教授在研究这一施暴形式时指出：

按照古今出现的普适性法律和法的原理，土改中的乱象涉及到多种犯罪，其中有的属于严重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的法外打人、杀人……对于土改中的种种乱象，中共的基本态度是将其视为革命中的“过激”现象，是“自己人”对“敌人”的行为。……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共处理运动乱象的基本政策，也从土改一直延续到“文革”。土改中的乱打乱杀等法外乱象，在以后的运动中一再出现，而且从事这种非法行为的人和被非法对待的人都有一些是从土改时期延续下来的，经历过土改的人都能从以后的历次运动中看到土改的影子〔8〕。

真可谓一语中的。如果我们把土改作为毛泽东时代第一个政治运动，把文革作为毛的最后一场政治战役，它们的共同点即是对某一社会阶层的大规模屠杀。不幸的是，这一社会阶层就是中共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文化大革命中有过三次震惊全国的对土改对象的大屠杀事件，其方式都是土改“法外杀人”的运动形式的延续和翻版。

其一，1966年8月26日至9月1日发生在北京大兴县的残杀土改对象——地富及其子女的事件，共杀死325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还是婴儿〔9〕。

其二，1967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发生在湖南道县及零陵地区的大屠杀事件，共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以地富为代表的土改对象及其子女占了近7,000人，为76%。鉴于这场大屠杀的组织者和执行者都曾认为他们是在进行“第二次土改”，这一文革惨案就带上了挥之不去的土改“法外杀人”的阴影。而整个屠杀，都是在“土改补课”等等蛊惑人心的口号中进行的〔10〕。

其三，1967年底到1968年下半年的广西大屠杀。据机密文件透露，至少8·9—14万人遇难，而其中土改对象、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占了56%左右〔11〕。

如果我们进行一下更深入的调查和比较，还不难发现，上述三次文革中的大屠杀都不过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例如，道县和广西发出杀人指令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其实不过是土改时期“人民法庭”的某种翻版。而施害者所采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斗争、再宣判，后用“刀杀”、“沉水”、“棍棒打死”、“活埋”、“火烧”等方法处死，完全是土改虐杀地主的全套流程。至于那些野蛮的私刑，也和土改中法外杀人的暴力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还有：刽子手在杀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后，还常常公开引用

他们集体无意识里深深积淀的“土改经验”。例如，加害之前，凶手们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财”——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土改时埋藏的“光洋”。并欺骗他们：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钱来，便可以买下你的命。（12）而在杀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后，凶手们一定不会忘了土改的传统——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财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里的青年女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暴徒们再也无法从受害者那里分得土地。因为第一次土改中他们分得的土地，早已经被中共在一两年后以“农业集体化”的名义收归了国有。

行文至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一个难以回答但一定要回答的问题：在当年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到底有多少地主在残忍的暴力下死于非命？在时过境迁七十多年、而中共又严密封锁档案的情况下，比较准确地计算出受害的地主的人数是很困难的。但是，根据一些已经公开的官方的统计材料，做一些合理的推测还是可能的。以下是根据多种官方文件推算出的中共建政初期土改中的地主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表格：

1950年|总农业人口：465,900,000|所占比例：4•75%|地主实际人口：21,880,000*
1954年|总人口：602,660,000|所占比例：2•6%**|地主实际人口：15,669,160
1950-1953年|自然死亡率：6•88%（4年）***|地主实际人口：1,505,344
差额（非正常死亡）4,705,496

*这一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土地改革前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一表，载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353页。

**这一比例来自1954年23个省、市、自治区1•5万多户农家资料统计的《全国土改结束时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载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560页。

***1950—1953这四年的自然死亡率，根据国家统计局《1949—2003年中国大陆历年人口资料》一表得出，原载百度百科：
<https://wenku.baidu.com/view/16182d99b52acfc789ebc9e5.html>

关于土改期间中国地主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算法是：1950年土改前地主实际人数（21,880,000人）—1954年土改结束后地主人数（15,669,160人）—4年自然死亡人数（实际人口×四年自然死亡率=1,050,240人）=差额4,705,996人。

根据以上的计算，在三年的暴力土改中，中国所谓的地主阶级的非正常死亡（被杀和自杀）人数大约高达470万人。它应当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这一数字，和不少长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学者的估计相同（13）。

根据有关看到过机密中共文件的作者泄露，到毛泽东死后的1977年，全中国地主大约还有279•7万人幸存（14）。换句话说，自土地改革以来的24年里，中国的地主阶级共有1808•3万人死亡。他们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贫病交迫的政治歧视中漠然逝世。作为一个有两千多万人之众的中国富裕农民的“阶级”，被中共从肉体上残忍地消灭了。

第三，中共土改运动“原型”中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劫掠私产的国家财政机制。这里的“劫掠私产”当然是指对国民私人财产的大规模的抢劫和掠夺，而这些行为则又常常是得到国家政权的默认或公开鼓励的。

土地改革时期大规模的分地主“浮财”的现象可算是这类形式最早的“原型”。紧接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三反”、“五反”运动里，对所谓的“不法资本家”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追逼和没收他们的私人钱财，应当是这一“原型”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一“土改情结”有了恶性的发展。最典型的是1966年8月，由北京红卫兵发起，继而在全国范围风行的对“阶级敌人”的抄家运动。本次会议的不少论文都揭露了造成土改大规模法外杀人的契机，常常是那些所谓的“土改积极分子”（实为地痞流氓）的“追逼浮财”。但是由此引起的种种酷刑和杀戮，从来没有得到国家政权的惩处。至于1966年红卫兵的“红色恐怖”，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竟发表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公开赞扬红卫兵抄掠公民“隐藏的金银财宝”的非法行为（15）。

为什么中共的国家政权要纵容和赞扬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强盗行为？其实背后还是有不可告人的、又非常实用和功利的财政目的的。例如，据大陆学者曹树基的研究，中共在土改初期所发动的“减租退押”运动，其隐藏的经济目的是为了把这一运动的胜利果实来充实1951年政府的新增农业税，并以此来支持朝鲜战争（16）。同样，不久后，“三反”、“五反”运动里逼出来的工商业者的财物，也被用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毛泽东就高度评价了这种做法，喜形于色地称赞道：“『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朝鲜战争）一年半。”（17）在1966年10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颁发了一份赞扬红卫兵的“巨大功绩”的机密文件。该文件透露，仅红卫兵抄家所得的现金，就有人民币428.8亿元；美钞355.8万元（相当于人民币875万元）；英镑和其他外币373.9万元（相当于人民币2,566万元）；黄金120万两（相当于人民币1.5亿）；白银30.8万两，银元978.9万元（相当于人民币1,300万元）（18）。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6年全中国的GDP按人民币计算，不过就是1,888.7亿元。仅这几个月内抄来的现金，就有432亿之多，占1966年全中国GDP的23%，而且还是立刻可以流通的现金。对于文革初期面对因为动乱而造成的国内生产急剧下降的中国政府，无疑有雪中送炭的危机救援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怎么会不对红卫兵“巨大功绩”大加称赞呢？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种劫掠私产的国家行为，竟很快就从国家纵容农民对地主富农私有财产的劫掠转化为国家对农民私有财产的持续劫掠。1952年，全国性的土地改革还没有结束，中共已经开始强力推行农业合作化。在以后的数年内，中国所有的农民——不管是被贫下中农剥夺了土地的地主富农，还是刚刚获得土地的贫下中农——全部被国家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不仅如此，中共还在1953年强行推出“统购统销”的政策，超额征集农民的余粮（实际上就是口粮）。因为合作化了，农民便失去了他们刚刚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其人身也不得不依附于党国的基层细胞——合作社及其干部。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全国1.1亿户个体农民，被组织到了约100万个农业合作社。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就不需要再直接与农民发生联系了，统购与统销都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进行。就这样，农民作为生产者，就不仅失去了对土地的支配权，还进一步和他们生产的粮食完成了剥离，彻底地失去了对粮食的支配权。有论者把这一过程称为“第二次土改”，也是不无道理的（19）。

作这一如是观，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也可以称之为“第三次土改”。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关于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讨论中，总结出了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既然人民公社化后的整个农村都变成了军队和兵营，那当然就不允许有农民再有任何私人财产。当时，毛就和徐水领导人张国忠等兴致勃勃地讨论过“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生活用品外，关于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转化为公有。”（20）毛泽东的倡导很快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对数以亿万计的农民私有财产彻底剥夺和劳动力的恶性毁坏。以徐水为例，“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影响下，有些村庄鸡猪和树木也

归了公，把锅砸掉炼铁，户户不冒烟，全去吃食堂，有些地方甚至连箱箱柜柜都归公有。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住房也要拆除……〔21〕”更有甚者，中共在大跃进一大饥荒后期的“反瞒产运动”里，对农民完全采取了土改斗地主的方式——刑讯逼取他们的最后一粒存粮。以“信阳事件”中的“反瞒产运动”为例，“全区被打致死群众达六万七千余人，被打致残三万四千余人。残害群众的酷刑在几十种以上，如吊梁、跪砖、砸牙、剪耳朵、刺手、缝嘴、火烧、铁烙、火葬、活埋等等，真是残忍毒辣，骇人听闻。〔22〕”曾几何时，作为中共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者的中国农民，不仅在数年后就失去了他们的全部私有财产，还沦落为国家机器最悲惨的农奴，活活饿死了数千万人，成为中共土改运动的最大的失败者。

◇ 破除“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神话

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开篇中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23〕。这是长期以来纠缠着读者甚至研究者的又一个革命神话。对此，美国学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很早就提到，不少西方学者当时就都有异议。他们认为：“分配土地本身并不能在中国产生健全的农业经济。它既不能创造出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也无法消除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24〕。另一个美国学者马若孟（Ramon H·Myers）也曾指出：“1950年以来的事实证明，1950年代土地改革与其说是促进不如说是阻碍了农业生产力和产出的增长，因为这一改革消灭了私有制，从而抑制了刺激工作和革新的动力”〔25〕。其实，一个简单而清楚的史实是：中国真正的全面工业化是在1978年后30年间的“改革开放”中才实现的，这离“土地改革”已近六、七十年之遥。因此，土改“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之说实在是离题万里之谈。

中共政府和其官方学者一直用“土地改革”后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加来说明它的革命神话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被引用得最多的是当时的政务院副秘书长廖鲁言的说法，即“一九五一年全国粮食生产量较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今年可较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可超过抗日战争以前最高年产量百分之九。〔26〕”这其实也是经不得仔细推敲的。首先是中共的统计数字常常是因政治需要而夸大的，不足为信。廖鲁言写这篇宣传品时，尚在1952年的9月，统计数字根本还没有出来，但他就急不可耐地炮制出“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的增长率了。其次，中共用平时时期、即50年代初期的产量来和40年代全国性的战乱年代相比——无论是抗日战争（1937—1945），还是国共内战（1946—1949）时期——都不是一种公正的比较。最后，战后中共统一了中国大陆，在和平的环境里拥有了激增的人口和多余的劳动力，可以用来大量垦荒和精耕细作，如果没有总产量上的增加才是不可思议的。

已故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高王凌教授对土改素有研究，他是比较早挑战土改“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学者之一。在本书所收的〈土改的极端化〉一文中，他就指出：“土改的目的，最初的说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但是土地改革的这种作用，一时间却难以看清，有时还不难发现相反的例证。如各地都有经验表明，土改后的头一二年，生产往往出现下降。”参加本次会议的加拿大独立学者滕春晖和大陆学者马锡昌一起递交了一篇题为〈土地改革对农村生产力和农村社会生活的损害和影响〉的论文，也指出〔27〕：

大多数地主是“小地主”，往往是靠勤俭持家和种田本领及经营有方发展起来，他们几乎都亲身参加农业劳动。对他们的剥夺，就消灭了这部分人的生产能力，……所以在当时中共内部关于经济问题的多份文件中，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承认，土改造成了群众普遍的生产困难。1948年5月10日，中共东北局后勤部党委在《目前后勤运输状况的统一与使用》一文中说：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比伪满时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不

如。减产是可以肯定的。原因：东北过去地主富农占很大数量，土改后大生产破坏了，土地小块小块分给农民；而农民组织和经营的经验不足；使我们减产。这是第一。第二，土改中打击面宽了些，使过去生产中占很大数量的中农、富裕中农被打击，因此生产情绪受到影响；第三，地主富农土改中打的狠一些，生产有困难（种子、牲口、农具）影响一些生产；第四，农村劳动力减少很多，参军参战数字很大——生产力水平回到少帅那个时代。

其实，我们即使用中共自己五十年代的一些统计资料，也可以看到在人均粮食产量上非但没有增长，相反是倒退的：

年份	1 9 3 6 年	1 9 5 0 年	1 9 5 2 年
粮食产量（亿斤）	2，7 7 4	2，4 9 4	3，0 8 8
人口（万人）	4 7，1 1 0	5 5，1 9 6	5 7，4 8 2
人均产量（斤）	5 8 9	4 5 1	5 3 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5 9 年，粮食中不含大豆。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 9 9 1 年。1 9 5 0 年和 1 9 5 2 年的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1 9 4 9—2 0 0 3 年中国大陆历年人口资料》一表得出，原载百度百科：<https://wenku.baidu.com/view/16182d00b52acfc789ebc9e5.html>

另外，从各地“土地改革”运动的原始档案里，我们也常常发现中共的暴力土改对农业生产直接的严重破坏。例如，贵州省清镇县，原是中共“土地改革”的试验区，在土改后却出现了农民不想生产，让土地大批抛荒的现象。中共贵州省的机关报《新黔日报》如此报导（28）：

清镇一区芦荻乡右二村是今年春季土地改革试验区。土地改革后，于八月间经检查，该村丢荒田土现象很严重。……其中以贫农丢荒土地最多，自耕中农次之。全村合计共荒田六石六斗，占全村田面七十石零六升二合的 9·4 2 %；共荒土五斗七合半，占全村土面五石四斗五升的 9·7 8 %，共丢荒产量合 3 2，5 6 4 斤，占全村总产量的 5 3，5 1 7 斤的 6·3 3 %。所以造成如上丢荒田土的严重情况，主要原因是该地各级领导忽视领导生产，指导思想上对生产的重要性认识不明确；对土地改革后的生产问题没有深入下去了解情况，只盲目认为土地改革后群众生产情绪高，在这上面可以不必多化（花）工夫。……土地改革后，又没有讲明租佃、雇佣自由，只是机械地动员群众生产，一些缺乏劳动力者，为了避免剥削改变成分，怕把田土出租。如中农黎明春，共有七斗田，前几年出租二斗五升，今年全部收回自己种，结果荒了田二斗。

这种破坏更是在精神层面的。因为“斗争土改”的盛行，使农民在几千年来形成的勤劳致富的信仰轰然倒塌，使他们不愿意通过生产来发财致富，在不少地方竟造成了人为的饥荒。山东的莒南县、内蒙古的赤峰市乾村都是如此。据机密档案记载，整个山东暴力土改后 1 9 4 8 年出现了空前的歉收。莒南县一直到 1 9 4 9 年还没有摆脱灾荒的阴影（29）：

发生饿死人、卖老婆、卖小孩子的严重现象，如莒县大石头区朱家庙子村一老大娘，即因挨饿而吊死，城里民村唐林民饿死，郑×仁要卖老婆，于×文要卖孩子等。

土改对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极大消耗，不少中共领导人也是有清醒认识的。1 9 4 7 年 8 月 2 7 日，董必武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就说过（30）：

社会上的积蓄在土改中大量被消耗了，过去各地都发生过这种现象，领导机关不注意就消耗得更多了。在斗地主、富农时，斗来的果实吃掉了一些，用掉了一些，由集中到分散不可避免的要毁损些。有些地区中农在土改中，也故意消耗他们自己的积蓄。如在执行政策中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再加上地主富农的谣言，那就消耗的更多。地主富农消耗，甚至故意破坏自己的积蓄那是更普遍的现象。

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风风雨雨的中国人，应当起码明白文革中流行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中的两者其实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因果关联。在现实生活中，革命终究是破坏了生产力的，尤其是在暴力革命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内。当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社会和政治震荡后，生产也会逐渐得到恢复和增长，但这不过是政治震荡后的非革命的“和平”带来的经济恢复和好转而已，它们绝非是结构性的增长，更不是中共及官方学者们所吹嘘的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

◇ 新视野·新史实·新思考

本次会议的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开场：由来自日本、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学者一起组成了题为〈国际和比较视野下的土地改革〉的首场讨论。土地改革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是自中共始的新鲜事物，也并不一定要充满流血和暴力，以牺牲几百万无辜的人命为代价。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过日本的土地改革。五十年代几乎和中共的暴力土改同时展开的，还有台湾的和平土改。日本学者日吉秀松教授在他的〈日本的农地改革和民主化〉详细地介绍了日本战后在美国为首的盟军总司令部指导下的土地改革。他指出，虽然“这场土地改革是在外国势力压力之下进行的”，但是“在没有发生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实施了这样的巨大改革”。日本土改的形式是和平的，是政府通过佃租地的强制收购以解决农村贫困。它不仅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日本消除军国主义的基础以及在农村实现民主化之目的也获得实现，同时，日本的土改成功地农村阻止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台湾学者周茂春博士，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廖应豪先生和旅美华人作家余杰都就台湾和大陆土改的对比发表了精彩的见解，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他们都认为：台湾五十年代初期的“兼顾地主”的土改是非常成功的，如余杰所言（31）：

中国的土地改革指向“耕者无田”的国家资本主义，台湾的土地改革指向“耕者有田”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此一脉络之下，两岸的土地改革形成了四个重要的差别：第一，社会及历史背景不同；第二，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不同；第三，实施方式（主要是暴力程度）不同；第四，对此后两岸的经济、政治发展路径的影响不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土地改革都是成功的。北美的国际共运史专家程映虹教授把北朝鲜、北越的土改和合作化，与中共的土改和合作化放在一起考察，指出它们的共同点是（32）：

共产党革命在农村政策上的“初衷”是建立对农村的全面控制，在社会经济政策上则是通过土改建立小农制度，但很快就向集体化过渡。这个集体化可以是合作社，也可以是人民公社，总的倾向是越大越好，因为越大就意味着国家控制能力越强。……从土改到合作化，这些国家经历的，实际上是从身份自由的个体农民沦为国家农奴制的过程。

本次会议还标志了在中共土改研究上的一些重要突破。其一是提供了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的新史实；其二是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土地改革既然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应当一开始便是中共以“施恩者”的名义出现，给农民分配土地。然

而，本书却掀开了为重重迭迭的谎言覆盖着的昨天的真相：中共首先是以“剥夺者”的面目出现，一解放便向农民横征暴敛，激起了全国性规模的民乱和“匪变”。但多年来，在“土地改革”旗鼓的遮蔽下，学界忽视了1949—1951年新中国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近年来，基于档案资料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有机会把关注视角转向新中国初期的征粮、减租退押、经济清算以及财政金融物价等系列运动，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展。

华东师范大学王海光教授递交的〈土改的前奏曲：中共建政时期征粮问题再探讨〉和〈民变和“匪乱”——中共贵州建政第一年征粮事略考〉两文，就告诉读者“中共占领新区之初，立脚未稳，就急如星火地在当地征收1949年度的公粮，禁止银元贵金属货币流通。征粮数额大，方式简单粗暴，激起了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以至酿成大规模的民变和‘匪乱’。……新区征粮和匪乱的研究，呈现出了中共建政过程更为复杂的历史面相，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土地改革为建政中心事件的历史叙事。”〔33〕与此类同的还有曹树基教授的〈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一文。曹文指出：“为增加财政收入、缓解政府压力而进行的‘大户加征’与‘减租退押’是实质性的土改，而土改中的分配土地，只具有象征的意义。在实践的层面上，‘大户加征’与‘减租退押’的本质是征粮，而土改中分配土地的目的之一，也是征粮。这是因为，经历过‘大户加征’与‘减租退押’之后，地主阶级已经无力承担高额的农业税，而分配土地，就成为调整税基的最好方式。”大陆青年学者刘诗古依据新的史实，得出了如下对官方叙事极有颠覆性的结论〔34〕：

我们可以形成关于土地改革的三点新认识。其一，1949—1950年，中南区各地农民已自发不向地主交租，这实质上意味着土地产权关系已发生变化。佃户拥有了该块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转让权被中共禁止，地主对土地没有了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权属占有，“土改”已经发生。其二，为了避免在收不到地租的情况下，继续承担一年两季甚高的阶级累进农业税，地主阶级多希望政府早日土改，而并非如过去所言的那样，地主阶级对“土改”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和垂死的挣扎。其三，中共政权在新解放地区有意实行农民继续交租，随后依法减租的政策，刻意推迟“土改”时间，以便有充分理由对地主阶级征收高额的阶级累进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在填补以往研究的空白方面，会议的其他参加者们也很有建树。大陆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生刘志递交了一篇题为〈国共内战中的土改难民（1945—1949）〉的论文，揭开了土改史研究中一个长期无人注意的侧面：“土改难民”现象。国共内战期间，因中共在解放区的暴力土改，造成的空前的人道灾难——“土改难民”竟达近四千万之多！北美女学者李江琳是研究藏族和西藏问题的专家，这一次却为会议提供了题为〈中共在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以云南为例〉的论文，为学界了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提供了难得的窗口。其实，也有少数中共的干部比较务实，对暴力土改有所抵制。原澳门大学教授程惕洁的〈内蒙东部“温和土改”与乌兰夫的文革倒台〉一文告诉我们：原中共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在主政内蒙20年间（1946—1966年），曾在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成功抵制并及时修正东北局的左倾政策，推行过著名的“三不两利”政策（不分、不斗、不划成分；牧主、牧工两利）。这一政策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使内蒙在大饥荒时期，接收并救助了几十万内地流民，并以余粮支援了京津沪。但是，这些都成为文革中他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整肃倒台的原因。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有逆中共的暴力洪流行舟，凭着一己之力大声疾呼、反对中共土改的先知。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介绍了当年上书毛泽东的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先生。北美学者丁凯文的〈董时进 vs 毛泽东——中共土改的回顾与辨析〉非常详细地梳理了董先生在他一系列著作中从根本上质疑毛泽东的土改思想的理论要点。这一总结提纲挈领，使董先生被岁月尘封了七十多年的前瞻性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大陆学者、原北京大学社会

学教授郑也夫先生也递交了一篇长文〈土改中的四位公共知识分子〉。那四位公知，除了坚决反对中共土地改革的董时进先生，还有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吴景超教授；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的费孝通教授和清华大学的潘光旦教授。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后三者和董时进先生不同，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土地改革。当然，他们都反对暴力土改。另外，他们的身份既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又都是当年中共在内战中的同盟军——民盟的主要成员。由于对中共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都没有像董时进先生那样，果断地选择流亡海外，而是接受了中共的统战和洗脑。最后，他们竟然都接受和认同了中共的暴力土改。因此，这一论文实际上已经把探索拓展到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和土改关系的崭新领域。在该文的结尾中，郑也夫教授对知识分子的集体投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诸如“保守主义的缺失”，“封建话语权上的放弃”和“土改中的冷血和自私”等原因。最后，他的总结给人以经久的震撼：

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赞同暴力土改，是中国文化精英的良心泯灭，是中国知识阶层的集体投降。认可了这一次强暴，就很难抗拒下一次强暴。认同了对他人的强暴，也就极难阻挡对自身的强暴。因此土改中知识阶层的表现是决定性的，所谓初战就是决战，从此他们在与中共的博弈中，如同小儿，任凭摆弄。

对中共暴力土改的新探索和新思考，一直是这次会议的重点所在。

中共为什么一定要使用暴力土改？对此学界有过种种有意义的探讨。例如，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认为：“农民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有了投名状就不怕发动不起来了”（35）。对此，高王凌则提供了一个更扩大的政治框架来理解土改暴力，他认为中共土改的重点并不是为了分田，而是为了“推翻旧的政权，同时建立新的政权组织和政治制度，特别是在基层自下而上地进行重组……也就是说，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天换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斗争土改’的道路”（36）。原重庆师范大学外贸学院的谭松教授，因为坚持对川东地区的土改真相进行独立调查，被中共开除了公职。对中共的暴力土改，他在实地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土改时的大屠杀，自然是要对地主乡绅和所谓反革命进行肉体消灭，但是，在屠杀过程中所使用的这些手段，它所呈现出的公开性、随意性、残暴性、奇特性等，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最大化地制造恐怖，要让那些活着的人对这个刚刚登场的红色政权心怀恐惧从而服服帖帖不敢反抗”（37）。加拿大维克多利亞大学的讲座教授吴国光博士则更进一步认为：“激发仇恨，制造仇恨，固化仇恨，既是土改暴力的原因，也是土改暴力的结果；……从而为建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在占据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中打下群众基础。随后，当无产阶级专政施展威力时，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刚刚获得的土地即被剥夺；土改中的暴力弥漫，也就为中共政权此后快速地强行收归土地为国有化铺平了道路。（38）”

另一个长期以来对家乡山西省平州县的土改进行实地调查的学者，澳门大学社会学教授郝志东，则以西方社会学的社会互动的理论，对土改中的暴力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土改的暴力是干部之间、干部与农民之间互动的结果。干部需要让农民克服‘命运、良心、人道、面子’等传统思想，和地主富农‘撕破脸’，农民也需要接受这种发动，然后暴力土改才有可能。让干部‘放手’，让农会说了算，也经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重新定义阶级、命运、良心、面子等观念的过程”（39）。

论及暴力，与会的学者们还注意到了与土改并行并为之服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关于镇反运动的学术研究现状，杨奎松有过论述：“对于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镇反运动，至今尚未见多少深入的学术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当中，镇反运动的

作用向来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是争议最少的。”镇反运动之所以“争论最少”，根据杨奎松的说法，是因为“共产党领导之革命政权初创，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固其根，以立其威，亦向被国人视为情理中事。”〔40〕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奠基是否必须来一场如此大规模而又如此血腥的镇反运动？北美独立学者和民主运动理论家胡平在他的论文〈背信弃义＋残暴的史上之最——对中共镇反运动的盖棺定论〉中批驳了这一说法。他认为：“这种评价是基于对镇反运动性质的严重误解，所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作为革命政权，中共在建政初期镇压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活动，本是例行公事，是中共各级领导早就在做、而且一直在做的事。既然如此，哪里还用得着最高领导人特地出面发文件，专门搞成一场大运动呢？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共发动镇反运动，其实是借题发挥，是假借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名义，……去镇压那些并没有从事过什么反革命活动的另外的群体。”通过分析毛泽东自己的指示，胡平一针见血地指出：镇反运动“是假借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旗号，对那些只是历史上曾经反革命而没有任何现行的反革命活动，并因此得到当局承诺宽大处理的群体算历史旧账。”

镇反运动中的重要对象之一是所谓的“反动会道门”。长期以来，对这一课题海内外都缺乏研究。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这一次递交了一篇〈中共摧毁会道门和极权主义的建立〉的长文，填补了一个久违了的学术空白。根据沉实的历史档案，夏文首先考证出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前，对所谓的“反动会道门”是一贯取“实用机会主义”态度的，“从1921年中共建立到1949年中共建政，共产党对会道门是既利用，又打击”。但是，“从1950年到1953年，共产党对所有的会道门一概定为『反动会道门』，开始了全面残暴镇压时期。”“从1954年至今，中共／中共政权对会道门和后来定位为邪教的组织开展了长期监控、露头就打的高压常态时期。”在细致地回溯历史后，夏文不无幽默地总结道：

毛泽东和中共罗列的所有指控“反动会道门”的罪行：落后封建迷信、家长制统治、教主崇拜、阴险残酷的戒律、被外国势力操纵利用、称皇称帝、对道徒剥削摧残、骗取钱财、奸污女道徒，等等，今天无一不可以用来起诉中共和它的首领毛泽东。中共对会道门成功的迫害和屠杀，主要是它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能把现代意识形态和政党方式与现代军事武器和科学结合起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毛主义教门。

以上种种，大会都把对中共的土地改革和整个中国当代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为学科建设树立了开拓性的典范。

◇ 重审中共土地改革的当代性和挑战性

在这一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正在反历史潮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方面，他们公然取消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如领导人的任期制，企图把已经前行了50年的历史车轮拉回到长夜未央的毛泽东时代去。另一方面，他们更加大掩盖历史真相的力度，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重新制造出种种光怪陆离的革命神话来。

在本次会议中，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郭建教授提供了一篇令人兴趣盎然又寻味无穷的论文，即〈五个《暴风骤雨》中的土地改革〉。这里说的五部均以《暴风骤雨》命名的作品包括周立波的长篇小说（1948）；谢铁骊执导，于洋主演的黑白故事片（1961）；蒋樾、段锦川导演的独立制作纪录片（2005）；凤凰卫视的5集纪录片（2012）；以及何涛执导，2015年开拍，至今尚未播放的50集电视剧。前两部——周立波的小说和于洋主演的故事片——当然都是服务于中共政治的、被称作是“中国土改教科书”的红色经典。在改革开放以后，它们都受到了同名的独立制作纪录片无论在史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

的全面挑战。然而，在故事片《暴风骤雨》问世半个多世纪以后，在2015年，根据小说《暴风骤雨》改编的影视作品又在策划中，即规模颇为可观的50集电视剧《暴风骤雨》，由何涛执导，同年5月19日在黑龙江伊春开机。这部电视剧仍被称作表现土地改革的“红色经典”。但是，据“东北网”，剧本“在充分尊重原创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取舍、改编……”，在红色经典的旧瓶中装上一些如爱情、传奇、谋杀、复仇之类的离奇情节。对此，郭文一针见血评为“红戏粉唱”：“既符合官方30年来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导向，又迎合许多观众对匪特传奇、女中豪杰的恋情，像是一种微妙的妥协，不失为寓教于低俗娱乐的典范。”

同样，夏明教授关于中共摧毁会道门和建立极权主义的论述也并没有忘却从历史中观照现今。他指出：“人们担心，当下的中国是否有迹象在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完成这篇论文后，我的担心是：‘文革’还有底层造反斗走资派/当权派，而当下的中国是一个教主似的‘领袖’在乌托邦理想的激励下，对持异议和反对他的‘敌人’开始了以极权国家暴力机器为主体的残酷镇压。所以我们该问，中国是否在走向‘镇压反革命’/‘镇压会道门’时期？”

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中共的种种倒行逆施反而使这次研讨会有了独特的挑战意义：它是中华民族不泯良知的一次体现；它象征着海内外知识分子对学术自由的有力坚持；它还是海内外学者共同重构对所谓的“新中国”的集体记忆的不懈努力。

除了揭示历史真相，健全民族记忆外，这一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的努力还有什么另外的当代意义呢？会议的发言和学者们递交的论文在这方面也有独特的贡献。他们一致指出：中共土改对当前中国的影响是一方面造成了执政党的全面腐败；另一方面是滞后了中国的现代化。例如，谭松教授的论文〈从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到土地财政〉指出：因为中共的土改“用暴力将私有财产变为所谓的公有，然后又用权力将公有变为权贵们的私有”，竟成了中共当前极端腐败最主要的历史渊源：“中共官员腐败，60%以上都与土地有关”。一方面，中共这个“党国”大地主“通过出卖土地养活庞大的地方政府官员”；另一方面，“中共各级官员在卖地中大肆中饱私囊。（41）”旅美作家余杰的思考更为深入。在参考了众多西方学者对于台湾式的土地改革对现代化的贡献后，他指出：人类历史上，除了欧洲与英美国家（英美加澳纽）之外，仅有三个国家完成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日本、南韩与台湾。而这三个国家，都成功地进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他认为：“台湾相对而言比较成功的土地改革，或许能为中国未来的土地改革及民主化提供有益的启发。（42）”

多年以来，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博士奔走于京沪之间，大声疾呼“吾民无土”（43），要求改变大陆的现有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私有。这次会议他也递交了论文〈暴力剥夺型土改，强制型农业集体化——中国城乡发展错序之制度根源〉。这一论文对我们了解中共土地改革对现代化的恶果极具启发性。该文运用诺奖得主阿瑟·刘易斯（Arthur W. Lewis）的理论，来分析健康的现代化的转型要素。刘易斯认为：第一拐点是随着城市现代工商业的不断扩张，最后一个农村剩余劳动被城市吸收；第二拐点是城乡收入差的弥合。为了抵达这个拐点，必须不断地使最无务农技能和意愿，生产力最低，因而最贫困的农户首先离开农业。唯有这样，经过市场的反复淘汰，农村留下的劳力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才会越来越高，农村的人均收入才能向城市的人均收入靠齐。这不但是刘易斯的预言，也为欧美和东亚的例子所证实。但中国土改的例子恰恰证明，在经历了最激进的以消灭地主和富农为目标，土地分配最为平均主义的地方，不但农业没有现代化，而且城乡收入差居高不下，离开城乡一体化的理想目标仍十分遥远。这种对比是发人深省的。其实，在刚过去的40年中，中国遇到了百年未遇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良机。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问题无法解

决，城市中的户籍制度依然存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错序反而更为固定化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会必然地滞后。

重审毛泽东土地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在纽约举行两天后便顺利结束了。但无论是与会的学者，还是参与讨论的观众，都大有言犹未尽之感。然而，无论对“新中国”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建设的推动，还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要拒绝毛泽东遗产的警告，这个研讨会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近十年以来对中共土地改革和它的第一波政治运动研究的新成果，本论文集还收录了一些会议外的海内外学者的论文。编者希望：通过这本百万字的论着，读者不仅可以看到被中共当政者长期掩盖了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的真相，更可以看到史学家们不懈地探索历史真相、努力健全民族记忆的良好和坚韧。在这一意义上，本书绝不是这一探索的“结论”，而是它的新开始。

2019年9月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

注释：

1 黄黎：〈新中国土改是“历史错误”吗？〉，北京：《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19日。

2 见本书所收的〈由和平走向暴力的广东土改〉一文。

3 宋永毅主编：《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14年第一版。

4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1964年9月18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14年第三版。

5 同上。

6 “土改情结”这一提法，见颜智华〈中共土改情结与中共建国后四川涪陵地区的政治运动〉一文。<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baitai/20190427/1119842.html>

7 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_2

8 见本书所收的〈中共土改时期革命运动法制模式的形成及其历史影响〉。

9 宋永毅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10 谭合成：《血的神话：西元1967年湖南省道县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第517—522页。

11 熊景明、宋永毅、余国良主编：《中外学者谈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

12 同注9，第31、34，116页。

13 如高王凌的〈土改的极端化〉一文指出：“土改过程中约有300至500万人丧生，他们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地主，大多数是被活活打死的”。再如土改研究学者、《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的作者谢幼田也认为，“杀人数目至少是五百余万人。”纽约：明镜出版社，2010年，第268页。

14 冯建辉：〈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炎黄春秋》，2000年12期。

15 〈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29日。

16 见本书所收的〈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一文。

17 毛泽东：〈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7页。

- 18 〈请看红卫兵的辉煌战果和巨大功绩〉，1966年10月3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14年第三版。
- 19 同注7。
- 20 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 21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 22 1962年7月10日中共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见余习广《信阳事件责任人认罪书集》未刊稿，余习广提供。
-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
- 24 杰克·贝尔登著，邱应觉等译：《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614页。
- 25 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 26 廖鲁言：〈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1952年9月26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14页。
- 27 见本书所收的〈土地改革对农村生产力和农村社会生活的损害和影响〉一文。
- 28 〈土改未结合生产形成严重丢荒现象芦荻乡领导已作检讨〉，《新黔日报》（1951年9月9日），载贵州省档案馆编：《黔地新生：解放初期贵州土地改革档案文献选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0—152页。
- 29 〈莒南上半年生产工作总结〉，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2—1—32。此处转引自王友明著：《革命与乡村：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 30 〈董必武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问题的报告〉（1947年8月），《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828—829页。
- 31 见本书所收的〈杀人的土改与不杀人的土改：中国与台湾土地改革之比较〉一文。
- 32 见本书所收的〈是土地改革？还是通往国家农奴制之途？——有关北韓和北越土改的思考〉一文。
- 33 见本书所收的〈土改的前奏曲：中共建政时期征粮问题再探讨〉一文。
- 34 见本书所收的〈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一文。
- 35 见本书所收的秦晖〈暴力搞土改是逼农民纳“投名状”〉一文。
- 36 高王凌：〈土地改革：“改天换地”的社会变动〉，载《土地制度研究》（第一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
- 37 见本书所收的谭松的〈土改运动中的杀人和酷刑特性〉一文。
- 38 见本书所收的吴国光的〈以暴力型塑政治：中共为什么要在土改中实行暴力？〉一文。
- 39 见本书所收的〈社会互动与暴力土改：以山西省平州县为例〉一文。
- 40 杨奎松：〈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上）〉，载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江淮文史》2011年第1期第6—24页。
- 41 见本书所收的〈从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财政〉一文。
- 42 见〈杀人的土改与不杀人的土改：中国与台湾土地改革之比较〉一文。
- 43 文贯中：《吾民无土》，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

□ 来源：《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政治运动70年的历史回顾》，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2019年12月

~~~~~  
【追根溯源】

土改七十年来的“阶级划分”政策的恶意、随意性及其后果（上）

• 丁 抒 •

一、“阶级划分”是中共为颠覆中国传统的乡村文明而恶意挑起仇恨，制造敌人，建立其专制集权统治的手段

◇ 从不存在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

对社会划分“阶级”，源自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中共搞“土地改革”，称其目标是“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然而中国并不存在“封建地主阶级”。“封建”是“封疆土、建城邑”之谓，从皇朝获得领地并世袭相传者才是“封建地主”。而中国两千年前就不再有封建贵族。平民可以担任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县的各级官员。民间土地可以自由流转、买卖、租佃，“与任何他种物品的买卖、所有及租佃，基本上毫无区别”，“与所谓封建没有丝毫的关系。”〔1〕

中国农村土地买卖频繁。所谓“富不过三代”、土地“千年百易主”，大体一二十年易手一次。地主和农民的角色始终可以转换，也始终在转换之中。乡村无固化的社会阶层，地主和农民之间不存在一条阶级鸿沟。故中国历来只有地主而无“封建地主”，只有自由农民而无封建农奴。

中共也知道这一点。为了自圆其说，1945年9月颁布《土地法大纲》时造出一个新名词“封建性的土地制度”，说要“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1950年6月公布“土地改革法”时则再次退缩，废除“封建地主阶级”一词，自己否定了这个本不存在的阶级。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必然存在相互依存的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基于马克思主义，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都是被雇佣者创造的。雇佣者占有“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者”。这是雇佣者的“原罪”。

土地、农具等农业生产资料与工厂的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并无本质不同。工商资本家也有“剥削者”的“原罪”。把占有土地、牲畜的地主当作打击对象，与五年以后把占有工业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当作革命对象，出自同一个逻辑。但是中共当时还不打算动工商业资本家，为了把他们与地主富农区分开来，发明了一个奇怪的用语，叫做“封建剥削制度”。

〔2〕这就是1950年“土地改革法”宣称要“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的由来。

◇ 乡村社会无固化的阶级

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中国农村，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因天灾人祸或兵燹匪劫，经营不善或吃喝玩乐，地主、富农会变成贫农，而贫苦农民可以通过勤劳节俭买进土地成为富农或地主。一户地主的三个儿子继承遗产而分家，若干年后完全可能是一户地主、一户中农、一户贫农，甚至没有一户还是地主。。

土地租佃的双方自由缔约，无人身依附。佃农交租，地主交税。不少地方的佃农可取得永佃权，即长期土地使用权。而地主只有“田底权”，不得任意撤佃。佃农的租赁权即“田面权”可以出售，可以转租。佃户还可经由小额购买土地逐步转变为自耕农，甚至一代人就能变成富农、地主。

因土地占有变化频仍，中国的乡村社会无固化的阶级，不存在“地主阶级”与“贫农阶级”的尖锐对立和冲突。

学者杨懋春上个世纪40年代对山东青岛台头村社区的研究揭示，村庄中不仅没有阶级，连社会阶层也不固定。（3）河北延庆县城关东屯有两家人：卓家原是地主，但他好逸恶劳，卖地挥霍，土改时被评为“中农”。而姓张的一家勤劳节俭，按当地农民的说法叫“苦熬”，攒钱买地。结果成了地主。

内蒙古赤峰市的土改积极分子、在土改中加入中共的戴玉堂说：“（地主富农）怎么富的呢，追追他的根，百分之九十八，都是艰苦奋斗。”“就说老戴家，他们老哥四个，都扛活（丁注：给地主干活），赶后尾（土改时）都成地主富农了。”（4）

农民与地主的角色转换一直在乡村社会进行。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三个人的父辈都是实例。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本是湖南湘潭县的贫农，当过兵见过世面，又勤劳节俭，攒钱买地，靠自己完成了从贫农到地主的转变。1959年毛泽东回老家时曾说：“我父亲早死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要被搞成富农，受镇压。”（5）他父亲雇有长工，按中共的规定就是地主，应该“受镇压”。在湖南的确有无数像毛泽东父亲那样的地主在土改时被中共“镇压”了。

中共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老家与毛泽东的家乡仅相隔几十里。他也说过，他家能够富裕起来完全是他父亲和兄长“勤劳节省的结果”。

邓小平的祖父是四川广安普通农民，靠勤劳俭朴，又会纺线织布而发家。邓小平的父亲接手家业，土改时被定为“地主”。邓小平的岳父浦在廷原是云南宣威的苦力，跟着马队当脚夫。后攒钱、购置马匹，又开办火腿制作公司。其子浦承统被划为地主关押在宣威看守所时服毒自尽。（6）

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的父亲是个贡生，家境仅够富裕中农。刘文彩是第五个孩子，无钱上学，靠自己亦农亦商而发达，成为一名大地主。

基于频仍的土地权变动、农民与地主角色的流动转换，中共为了方便起见，以建政前三年为界划分“阶级”。即大部分地区以1946年的经济状况划定阶级。

◇ 为“发动群众”妖魔化地主：“恶霸”和“反革命”

农民都知道地主富农的土地是“苦熬”挣来的，不是偷来、抢来的。所以，绝大多数地方的土改，最困难的不是地主富农的反抗，而是农民的难以发动。

尽管发家致富的是少数，大多数农民相信勤劳节俭是致富的正途。他们所见的农村实际就是如此。中共以“封建剥削”为名斗争地主不为大多数农民认同，说地主富农是贫雇农的“阶级敌人”也不足以激发“阶级仇恨”。为达致“消灭地主阶级”的目标，须人为制造出“阶级仇恨”。最简便的法子便是妖魔化地主富农。

绝大多数乡村没有霸占一方、欺凌民众的大地主，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恶霸”不可谓没有，但为数极少。而中共为了“发动群众”，“激发阶级仇恨”，蓄意把地主与“恶霸”等同、与“土豪劣绅”等同，甚至冠以“汉奸”、“反革命”，以制造斗争、打杀地主的依据。所以，土改中最常见的场面就是“镇压”“恶霸地主”。

把谁定为“恶霸地主”，完全是随意的。只要有人指称某地主曾经欺压过谁，就可以定为“恶霸”而枪毙。当时任安徽砀山县唐寨区区长的魏化洲说，“那时，恶霸地主被集中到区公所里。只要群众反映哪个地主欺压百姓，区里就可以决定枪毙，拉到西门外就打了（丁注：枪毙），连县里都不用报。”1950年“五一劳动节”全区游行，在唐寨西门外枪毙了17名地主，罪名都是“恶霸”。〔7〕

即便无人控诉，也一样可定为“恶霸”。山西兴县木栏杆村张拖喜、张拖长兄弟磨豆腐卖，寒冬腊月也辛苦劳作。他们积攒的200银元血汗钱被“挖底财”挖出，工作队便定他们为“恶霸地主”。村民都认为他们不是恶霸，但求情不果，两兄弟一并被枪决。〔8〕

北京大学师生到江西吉安参加土改时，十九岁的女学生乐黛云担任一个四千多人的村子的工作组组长。他们按照《土改手册》划出了八个地主。其中一人是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的孤寡老头。一位副县长到该村，指挥召开大会将八人一并枪决。乐黛云争辩说他不是“恶霸”，老百姓也都为其求情，说他常为家乡做善事。但县长坚持说不杀不足以“发动群众”，下令枪毙了那八个地主。〔9〕

广西平乐县乐塘村地主尹承纪家住县城，1950年初和女儿一起出逃香港。夫人临上船时舍不得家产，未走。地主跑了就杀地主婆，给她安上“女恶霸地主”的罪名枪毙。南福村的女地主李巧初，在全区斗争大会批斗后推到路边的山坡上枪杀。区长警告在现场陪斗的各村地主：不老老实实配合土改，李巧初就是榜样。〔10〕

据今《平谷县志》记载，1948年土改时，“对地主、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不分，恶霸非恶霸不分，一般地主与地主中抗（日军人家）属、烈（士家）属、开明士绅不分。个别地区出现滥打滥杀、酷刑逼供现象，仅峪口地区（今峪口镇）就有七十二人被打死或刑后自杀。”〔11〕

除了“恶霸”，使用最多的罪名是“反革命”。

河南潢川县索性“以镇压反革命代替打倒地主”。凡是划为地主的一概定为“反革命”，进而处死。以致不少人为免于受耻辱、受刑，“一经划为地主即行自杀。”〔12〕

“恶霸”和“反革命”都是要“受镇压”的。江苏省苏南区土改期间以“恶霸”和“反革命”罪逮捕了14,413名地主，“镇压”了其中的3,219人，被打死的和自杀的还不在此内。〔13〕

◇ 恶意编造地主与佃农、雇工的“阶级仇恨”

作为生产资料的一种，耕地、牲畜、农具与工商业的生产资料并无不同。土地的租佃关系和雇工耕作，与工商业的劳资关系一样，有互相依存，也有利益冲突，但其间并无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

中国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得益于租佃自由的社会环境，地主与雇工的关系长期处于合理状态。今以河北省的几个县为例：

唐县，中等规模县份，1949年人口23·5万。抗日战争期间，地主雇佣长工，管食宿之外，按身体状况、技术高低，长工年工资按米折算，为30石—50石（丁注：一石合150斤）。短工，主家管饭外每日工钱为5至8斤米。（14）无极县，除伙食外，“1937年，长工一年（薪资）50—60元，月工6—8元，日工0·4—0·5元。”（15）武强县，除伙食外长工年工资30至50银元，季节性劳动月工资5银元。为地主锄地者“得收成的3成”，收割者“得收成的1成或2成。”（16）

其他地方亦大致如此。如辽东省复县（今瓦房店市），地主除管雇工的伙食外，每日付给的工钱是十斤米。

这些报酬均不低于1950年代乡村个体农户被中共禁绝之后大多数农民从人民公社（1958—1980）得到的劳动报酬。大多数“人民公社社员”一年劳动所得，扣除口粮钱后所得仅几十元人民币。有的甚至不仅分配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口粮钱，叫“补钱户”。农民说，“口粮靠集体，买盐巴还要靠鸡屁股。”即养鸡下蛋拿到集市上卖掉才有钱买盐。

中国大多数乡村没有大地主。连毛泽东自己也知道，“有许多乡村，没有大地主，只有中、小地主及富农。”（17）一般中、小地主家庭的生活与农民无大差异。据学者30年代对华北农村的调查，绝大多数地主过的是普通人家的生活。“地主家的伙食，除了家长稍好外，其他成员与普通农民区别不大。”“雇工伙食与雇主家人基本相同，甚至还要好些。”（18）河北丰润县常峪村做了一辈子长工的郝双庭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白天给东家干活，在东家吃三顿饭，晚上回家睡觉。在东家吃饭时，东家、他四个儿子和我一个伙计或两个伙计先吃，我们吃完后老太太和儿媳妇孩子们再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东家吃啥我吃啥。”（19）不少情况下，地主家人的伙食往往还不如其雇佣的长工。毛泽东自己就说过，他父亲给他家长工吃的饭菜要好过给他们兄弟三人的伙食。

辽东省复县在省委第二书记江华“地主、富农大绝根”、“不怕打死人”的指示下，打死了1,900余名地主富农（连同自杀者共2,850名）（20）。黄店屯村的周春富是被打死的地主中的普通一员，但几年后中共发表以在周家放过猪的高玉宝为署名作者的小说《高玉宝》，称周为“周扒皮”，编造周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让雇工起床干活的故事，以致“周扒皮”成了“万恶的地主阶级”的代名词。（21）周既无恶行又无民愤，更不是恶霸。人民公社时期，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公社干部要求在大会控诉周春福。孔与前东家无“血泪仇、阶级恨”，编造不出周的罪恶，反不自主地说起东家的好处来，说在老周家“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公社干部在惊惶之余赶紧把他拉下了讲台。

（未完待续）

□ 来源：《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政治运动70年的历史回顾》，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2019年12月

~~~~~

【童年旧事】

冬至的记忆

• 张 华 •

我的童年正值“文革”时期，是在贵州的偏远山区渡过。

儿时留下的冬至记忆只有一个字：冷。贵州偏远山区的那种阴冷、湿冷、冷到骨头都疼痛的那种冷，是北方人，甚至江南人都无法想象得到的。记得那时候的天气总是阴天多，而时至冬至的天就更加显得阴冷了，飕飕的风夹带冰冷的雨雪，让人心情抑郁，本应开心、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因这阴森、寒冷的天气变得沉重，喘气都显困难。

那时，我们家住在由破庙改建成的一长溜的家属院里，每家只有一间房，房间之间仅仅用木板隔开，即三面是木板，只有一面是黄土墙。这间房兼有睡觉、看书、烧饭、会客、卫生间、洗浴间的功能，“文革”期间还有开小会的功能。庙因是依山而建，山里的泉水也会渗过厚厚的黄土墙在墙面上留下印记和白白的硝花，在冬至时节如同看到冬雪一样，更使房间寒冷异常。那时贵州县城里大多数人家都烧原煤，但能买得起北京炉（铁炉子）的人家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家只是在靠木板墙的地上挖一个洞，这个洞通向屋外，在洞里架上一方形或园形的铁架子，把原煤放到铁架子上用木材引燃就可以取暖、烧饭，煤灰自然从屋外的洞里清除。条件好一点的家里，在这个洞周围再砌筑上一尺高的土台子，总称为地炉子。人在这样的土台子边烤火时安全，也方便围着地炉子吃饭时放置碗筷和其它物件。

冬至本是一个祭祖的严肃、庄重的时节，但是，在“文革”时期，这个日子也变得火红、滑稽和好笑。

冬至那天，一大早父母就起床烧好了足够四口人吃两天的玉米饭（五分之一的玉米粉和五分之四的大米混合在一起蒸制的米饭），碗也没洗就匆匆出了门，甚至都忘记把我锁在屋里了。

我一个人在家看了半天的小人书，突然听到外面的小孩大叫“游行了，游行了，快去看”，我扔下书跟在这帮小孩后面冲出家属院，冲下许多大石阶梯后来到大街上。我站在人群的前面好奇地看着许多大人兴奋而奇怪的动作。突然，看到一个担架抬了过来，担架上躺着早上还活力四射、到处跑动的邻居家正在读高中的大儿子，满脸、满身的血，吓得我双脚直打哆嗦，他也看到我，正要抬起身给我说什么，旁边的人急得轻声严厉地说到“躺好”，担架很快过去了。声浪极大的口号声又传来，同时，许多尖顶纸质高帽子在口号声中摇动着走了过来。突然，我看到父亲背上捆绑了一根大铁管子被人推着往前走，我张大了嘴，极悲惨地大叫“爸，爸，爸……”，父亲看到了我，推开押着他的人，冲我开心一笑，把铁管横抱到胸前，迈开大步急速地朝前跑去，看到父亲的样子，我的心也放了下来。游行的人远去了，那些小孩上来伸出大姆指说“你爸最了不起！”

看热闹的人群渐渐散去，我一个人落魄地回到家，爬上凳子，再爬上桌子，从蒸子（一种用来蒸饭的木桶）里盛了满满一大碗凉饭，再坐回凳子上，就着桌子上一大盆折耳根（鱼

腥草）和海带做的凉拌菜大口吃完饭，此时哥哥也不知道从哪儿玩了回来，匆忙扒拉了几口饭后又跑了出去。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我盼着父母和哥哥能早点回这既冷清又寒冷的家。

突然，门外传来急急、重重的脚步声，一堆人一下涌进家里来，里面有父母和父亲的几个同事，同事脸上、手上都有血迹。父亲马上把早晨封好的地炉子上的煤捅开，立刻火焰上来，房间里也暖和起来。妈妈端进一盆水让这几个人洗了脸和手，父亲把蒸子里的饭装满几个大碗，随手给了我一小碗。这几个人围着地炉子就着那大盆凉拌菜大口大口地吃饭：“这是吃过的最好吃的饭了，他们也不给中午饭吃，把我饿得比三年自然灾害时还饿得惨。”

妈妈把水壶放地炉子上说道：“你们也是，早上开什么会，怎不找一个晚上开，一大早被捉个现形，谁不知道你们几个是保皇派呀，被人看到凑一块还不通风报信。”

“不是急吗，这是救人的事，不抓紧时间那怎行。谁知道你们造反派那么快，昨晚就把县长给抓起来了，想利用今天游行把县长抢回来，这才聚一起。你们的人来，我们几个咬定打麻将，本想收了麻将牌了事，没想把我们几个抓起来关到黑小屋子里好长时间，把你家老汉叫出去后，就把屋子里的红灯打开，先让我们眼花看不清楚之后，对我们一阵往死里打，谁打的都不知道，都是一个县城里的，这是哪来的仇恨啊？打完继续关我们在那里，不是你去把我们出来，明天还不知道会怎样呢。张高汉（当地人对身高很高的人称呼），县长还保不保？”

我父亲把碗筷放地炉子上擦擦嘴坚定地回答：“保，怎么不保，县长对我有不杀之恩，不是为了县长我早做逍遥派去了，当什么保皇派。”

父亲同事忧心忡忡说到：“如果要救县长，还需提早让县长知道，里应外合成功的可能性才大。”

“刚才给看守的人说好了，放了你们，我买水果去谢他们，县长也关在那里，你们写一张条子，我给县长送去。”

父亲写条子时哥哥又不知从哪里玩了回来，满脸、满手、衣服上都污黑，母亲看了生气说道：“不在家里好好带妹妹，整天就往外跑，不知饿不回家，象样子吗？去，到外面把手脸洗了来吃饭。”父亲写好条子折好给母亲：“天黑了，带上两个小孩出门安全点。”哥哥急得大叫：“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我不去。”“没事，街上都是造反派的小兄弟们，安全的。”

我与母亲正走下石阶时，在微弱的灯光下看到一个脸和身上都有血迹的人朝上走来，母亲叫住他，定眼一看，就是早上游行时躺在抬架上的邻居儿子：“你快去水井那里把红墨水洗干净，回去不吓着家里人了。”

“早上已把小妹吓着了，是不？”我点点头，他接着说：“我洗了，洗不干净啊，只好让他们骂了，闹革命，怎么能没有艰难险阻呢。”

走在街上我疑惑问到：“李家大哥没事吗？”“没事，还不是为了让人们同情造反派，故意化的妆，小孩不可乱问乱说呀。”

猛听前面传来整齐的脚步声音，只见头戴藤编帽子、肩扛梭标（一种带尖头铁器的木棒）的巡逻队员阵式强大、迈着正步、黑压压地走了过来。领头的小伙子人对着母亲微笑打招呼并停下来拉母亲到一边说：“姐，不好意思，对不起了，早上巡逻时有人报告保皇派聚会，我去一看，姐姐也在那里，他们说正在打麻将。姐，你知道，我这人平生就最恨打麻将，现在形势一片大好，不出来闹革命，还搞那套四旧的东西。我收了他们的麻将并把人关起来，打人之前，我把姐姐提出来游行，省得被打，也让姐姐长长记性，中午饭我让姐姐吃我们一样的，没让姐姐受委屈。”

“没事，做得对，这不，你一句话，现在他们都回家了，都长记性了。”

“这是去哪？”

“不是说给那几个小子买水果吗，要说到做到，做人要讲信誉。”

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钱塞到母亲手里：“姐工作都没有，我是吃公家饭的，有工资，这不能让姐花费。我没时间买，姐帮我去买，这帮破小子，下次我要好好教训他们。”

我站在旁边听他们推让着，全身早已冻得直哆嗦，不断跺着冻僵的脚，脚上穿的棉布鞋早已露出脚指头和后跟。我心里想，母亲有这许多时间忙活革命的事，为什么不找时间给我做一双暖和的鞋呢？

母亲总算收下了钱，在昏暗的街灯下，我们走到了灯火通明的水果摊子旁，这是全县唯一的水果摊，冬至时，也就是苹果、梨、柚子和各种炒干果。我们刚到，老板娘就高声对母亲大叫到：“不得了了，造反派这次吃亏大了，被对手打死人了，你们这仇一定要报啊！”

母亲冷静呼应到：“是啊，都是同县城的，何必下手如此狠呢！”

母亲买好六只苹果付钱后，老板娘抓起一把瓜子放进我的衣服小口袋里，母亲赶紧制止“不可以，你用它是做生意的，见熟人都给，你这生意怎么做了？”

“我喜欢，你不要管。我只想说，你给小孩穿得太单薄了，这大冷天会冻坏孩子的。”

“没关系，小孩冻冻身体好。”

来到高墙围着的县大院，灯光仍是如黄黄的一个个小灯笼，拉长了人影，除了母亲和我，没有人迹的显现，深灰色的墙更使得这县城里的最高府邸显得阴森恐怖。转了无数个弯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大门前，门口有一个戴一顶大棉帽的小青年，抱着梭标两手掌来回磨擦着取暖。见母亲拎着苹果走来，小青年笑着说“姐，开玩笑的，你都当真，还真买来了，让大哥知道了非剥了我们几个人的皮。”

母亲把五个苹果分给屋里屋外的人后，拉着我推开一间房门。只见屋里的小黄灯下坐着一个瘦小的老头，头发很乱、很长，一缕缕掉下来把小小的眼睛挡着一半，嘴角不断吸着两根指头夹着的烟，烟头一闪闪的光照着一张满是皱纹黑黑的小脸。这就是父亲说的有不杀之恩、县里人人敬畏的县长吗，我有一点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的形象。

母亲把纸条和一个苹果递给县长：“过节了，也没有肉给你带进来，就吃吃苹果嘛。”县长看完条子抬头看着母亲说：“不要来救我，否则到时又是一阵打斗，不知又要伤多少人，甚至会死人。你和他们几个明天马上离开县城。”

“为什么？”

“今天大游行批斗我们，造反派的头头还没有精力注意到今天早上巡逻队抓这几个保皇派的事，小青年不懂事，义气重，让你把人领走了，等明天查起来，他们几个保皇派难保不会被乱打一顿，这亏还是不要吃。关于你，也只是积极分子，年轻人尊重你是大姐，说话还管用。但是，你放走了人，我怕他们还是会找你的麻烦，你还是与丈夫带上孩子回邻县的娘家，今晚就去头头那里请假，说老母亲有事。谢谢你让捆梆的人梆得很松、让押我的人别打我，今天没吃苦。等我出去了，我会让你和家人天天吃上肉”

回到家，那几个大人正在不停转动身子边烤火边热议着国家大事，因为，面向地炉子的那面是热的，但背向地炉子那面是冷的，转动着可使全身都暖和。哥哥也许是白天疯玩够了，此时正在床上打着呼噜。听完母亲转述完县长的话后，大家都赞同县长的建议，决定明天一早就走：“既然嫂子已请好假，张高汉就是请假去照顾老人，我这个副站长就安排你们几个和我下乡放电影。还有，我们人走了，造反派难说不来抄家，张高汉，你把放家里的保皇派旗帜给我，我带乡下去。”母亲从我的枕头里抽出一面红色的旗帜交给自称副站长的人，副站长接过旗帜感慨万分说到：“县里的头头们都是见过世面的南下干部、久经沙场，

姜还是老的辣，这帮娃子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为自己留退路，到时倒霉的是他们自己。”母亲笑着说：“我现在不是在为他们积德吗，到时都互相照顾照顾，不要记那么多仇。”

母亲抱我上床，让我睡觉。我在被子里看着这几个热血沸腾的大人怎么也不明白，吃不饱，穿不暖，还有这么高的热情去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是真的疯了吗？慢慢我进入了梦乡，梦里，冬至的这天，我穿着暖和的棉鞋、棉衣和棉裤，父母、哥哥和我围坐在地炉子边一起吃着香香、热热的饭菜。

□ 来源：《正安论坛》网站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